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演进过程与理性逻辑

陈宝胜,李学敏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凝结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探索,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演进的历史过程与理性逻辑,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历经政治方向确立、具体实践聚焦、经济目标重构、全面系统深化的演进过程,逐步从宏大的社会主义愿景,走向以经济建设为牵引、聚焦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最终升华凝结为“以人民为中心”“五位一体”全面系统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认识起、承、转、合的跃迁与升华。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重视历史经验总结,才能不断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演变;理性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4)01-0005-10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4.01.001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现代化百年探索的高度凝练,内含政治的高度、历史的厚度、实践的广度与理论的深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端于近代寻求救国道路的历史实践。从洋务运动的“器物现代化”尝试,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制度现代化”求索,再到五四运动对“文化现代化”的思考,都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探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学术热点。现有研究有的从中国共产党的引领^[2]、现代化与社会主义道路的融合^[3]、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的融合^[4-6]等角度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有的从对百年实践的全景阐释中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效与历史经验^[7-11]、阶段性实践目标的转变及转变逻辑^[12-15];有的关注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以“现代化”在党的文件和国家方针政策中的话语转变为标志,梳理中国共产党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外延的演变历程,分析中国共产党科学建构现代化观念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时代逻辑^[16]。这些研究取得了丰富研究成果,较为全面

收稿日期:2023-09-07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讲好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故事”(2023JZDZ038)

作者简介:陈宝胜,男,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治理等研究;李学敏,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现代化研究。

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但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演进过程的关注不足,未能有效厘清“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生成的历史脉络与演化逻辑。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演进过程与理性逻辑为研究对象,从“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生成的演进过程脉络中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追寻中国共产党求索“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理性逻辑,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奠基: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生发于近代西化思潮,他们在反思与批判西化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受西化思潮的影响,部分留学归来的早期知识分子主张中国现代化必须全盘西化,^①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弊端的基础上,向马克思主义寻找中国现代化出路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方向。从现代化的目的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救亡图存和解救劳苦大众,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性质和自由的虚伪性与之背道而驰。在认清资本主义面目的基础上,陈独秀批评资本主义是“藉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食”^{[17]204}。李大钊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以资本家为本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劳动者为本位”^{[18]4}。他认为从适应中国现代化实际的角度,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熟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组织形式是近代中国利用后发优势更快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选择,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已达壮年”而中国经济“尚在幼稚”,中国要在世界“自立”,就必须“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18]359-360}。1921年7月,中共一大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纳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1},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

“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前提和保障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马克思总结欧洲革命经验,认为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因而主张“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工人阶级专政”^[20]。这一论断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1919年8月,李大钊于《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如果“只信经济的变动”而丝毫不用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指导“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18]55}。陈独秀在1920年11月的《共产党》上提出了“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的设想^{[17]77}。蔡和森也在1920年8月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无产阶级不专政则“不能使产业社会有”,因而实现社会主义“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19]449}。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改善无产阶级境况”思想的指引下,1921年7月,中共一大提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纲领^{[19]1}。1922年7月,中共二大结合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以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剖析,明确了包括“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的革命目标,以及“统一中国本部(东北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政权形式目标^{[19]133}。可见,自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为目的^[21],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地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这是中国共产党经历大革命失败得出的结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度放弃了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随着国共合作中的矛盾不断显现,1925年1月,中共四大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无产阶

^①如胡适在1918年所写《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倡的“白血轮精神”,主张用类似“有无数量的白血球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认真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消灭干净”的手段改良中国。傅斯年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在于中国的旧习俗,在恶劣旧习俗存在的情况下,令中国的家庭成为“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并使人“不容觉悟出人生真义”。

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22]216}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辩证看待联合与斗争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的原因在于“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23]238}。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剖析中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具备彻底的革命性,因而要进行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共四大报告指出,“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22]219}。中共七大报告明确表示,“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24]158}。认识到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后,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路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苏联工农红军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暴力革命并最终获得胜利,然而中国复制苏联经验却使革命力量损失惨重。总结失败教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与工人阶级力量已经发展壮大的苏联不同,在持续了几千年小农经济体制的中国,农民才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就使党失去了主要的革命力量^{[23]12}。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将中国最广泛最有力量农民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此后,以工农武装割据为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人民的全面的战争”^{[24]139},得以实现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处于萌发形成阶段。在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反思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并在这一方向定位下,形成了三个基本认识:其一,明确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诉诸暴力革命,即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其二,确证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对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作用,这一认识也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思想源头;其三,认识到革命路线必须符合中国实际、必须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也为中国式现代化铺设了保护人民利益、依靠人民主体力量的底色。然而,虽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愿景,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的历史使命,但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如何具化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等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索。

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从宏观单一走向具体全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想,革命胜利、取得政权后,首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基。为此,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的任务^{[25]693},开展了对国民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必须首先“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25]704}。循此,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发展国营经济、逐步改造其他经济成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长”^{[25]707}的工作路线,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949年到1952年间,机器工业产值比重大约从17%增长到28%,国营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大约从34%增长到51%^{[25]703}。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要成分。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经济制度,以社会主义组织形式形成经济合力,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要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宏观愿景落地为现实目标,不仅要求变革所有制基础,还需要制定更为具体的实践路径。

新中国现代化目标经历了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转变。1949年3月通过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26]162}“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26]210}。随着实践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目标也从“以重工业为重心”转向“协调农、轻、重”。1953年12月,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25]709}。在以重工业为发展重心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从全面性和均衡性方面发展了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具体认识。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和“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两种发展重工业的方式,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27]25}。1957年2月,毛泽东重申了必须充分注意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方针^{[27]241}。其间,在工业化目标逐渐突出各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也实现了向更为全面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转变。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蓝图^[28],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从片面工业化转向全面系统的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29]。

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考虑人民长远利益、国家全局利益作出的现代化路径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启动初期,受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理论^[30]、朝鲜战争等因素影响,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1953年,周恩来提出效仿苏联工业化模式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认为底子更薄、面临国际形势更严峻的中国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主张学习有效应对战争威胁和经济封锁的苏联模式,走以国防现代化为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路径^{[25]354}。台湾问题、中苏边境冲突、中印边境冲突、越南战争升级等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防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备战”、实现国防现代化、建立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为国防奠定坚实的工业基础,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

在推动经济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同时,以文化现代化为引领的人的现代化也以一条隐性的线索逐步推进。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人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以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以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为基础。毛泽东对人头脑中不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奴性和愚昧展开了批判^[31],认为“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32],主张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指出“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27]225}。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33],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人的现代化的思想。然而,由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偏误,推进人的现代化一度演变成实践中的重大挫折,偏离了应然方向,给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伤害。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式现代化打好起了制度体系基础,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宏观愿景走向具体实践,开始更为全面地认识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其一,全面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目标从单一工业化向“四个现代化”拓展,初步规划了“两步走”的阶段性战略,进一步具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其二,突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保障,

明确了以国防现代化为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路径;其三,重视人的现代化的价值,尝试从文化改造出发推进人的现代化。经过这一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初步建成,但在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新中国快速实现共产主义愿景的急切愿望,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有所偏离,实践进程发生了较大波折。

三、深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

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国情出发,拨乱反正,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探索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经济建设,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推进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由于急于推进文化现代化、担心资本主义复辟等,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重点领域的把握发生了偏离,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出现波折。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在认识层面,邓小平摒弃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式理解,从社会主义和生产力关系角度重释社会主义本质,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34]64},“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4]63}。在实践层面,一是重设了现代化的中国标准及阶段性战略。承袭“四个现代化”概念,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35]的历史命题,党的十二大将到20世纪末实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奋斗目标^{[36]14},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37],形成了基于中国实践,分阶段、有步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二是创新性地构想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确立了独特的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框架,激发了市场活力,调动了人的积极性。自此,中国共产党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领中国人民转向以经济现代化为重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夯实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提供了体制支撑,而政治系统对现代化的支持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兴衰成败。改革开放持续深入,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一是认识到必须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消除障碍、提供支撑。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34]176}。由此,党的十二大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36]34},十四大提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38]28}。二是认识到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国民文化素质不够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34]220}。三是认识到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是一种体制性障碍^[39],必须将政府机构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前的政府机构现状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40]396}。党的十四大也提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38]29-30}。

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同时,科技现代化也被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世纪60年代,现代科学技术即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但由于“文革”的发生,科技现代化实际进展缓慢。1988年9月,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4]274}的论断,认为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在科技发展的动力来源上,中国共产党强调培养和巩固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性。为了

培养科技人才,中国共产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一,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邓小平指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34]275}。其二,大力推行教育体制改革。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在全国基本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41]。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后劲^{[42]718}。此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确定了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等教育改革政策^{[42]721}。

在全面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中提炼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目标,并围绕人民立场拓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维度。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40]182},“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4]364},“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34]255}。“有差别共同富裕”由此构成了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基础。其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江泽民从代际需求角度提出“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43]518},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并提出要重视“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43]543},强调缩小地区差异。胡锦涛主张“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健康素质,切实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44]170},强调“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44]291},将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健康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纳入人民要求享受的发展成果,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发展维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与人民需要之间的关系,提出造福人民是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并以此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维度确立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45]的现代化目标。尽管此时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尚未明确到生态领域,但中国共产党人对可持续发展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探索,都为中国式现代化朝着更为全面系统的发展方向做好了理论与实践准备。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全面深化。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立足“中国特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性地提出、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其二,初步认识政治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以机构改革为抓手,着手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制支撑;其三,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其四,重思社会主义本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4]373}的创新性构想,解除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些思想藩篱,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四、升华:“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高度历史自觉,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凝结成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全面升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系统擘画、推进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46]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不断升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平衡、充分、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2012年11月15日,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其后,在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要求。2015年10月,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6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46]213-214}。这些重要论述凝结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十大报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系统性表述,形成了完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

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47]238}。首先,立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高质量发展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稳定的经济动力内核。习近平指出,“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47]237},强调“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46]267}。其次,立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多方位、多层次的需求,高质量发展以协调为内生特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47]234}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兼具“物质富足、精神富有”^[1]的发展目标相契合。再次,立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以绿色为普遍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原则。习近平提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并以“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48]概述了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复次,立足全世界人民发展,高质量发展以开放为必由之路,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示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47]241},是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要求。最后,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现实成就,中国共产党倡导“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46]42},主张“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49]。

要实现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的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必须有整体提升的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保障。在持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50]791}的必由之路,是新时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51],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等写入党章^[5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提出全面改革要求,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50]272}。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取得的“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的成就,并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机构改革作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署^[1]。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提出的新任务,以“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为目标,围绕“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深化全国人大机构改革”“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深化全国政协机构改革”“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提出更为具体的系统性深化改革要求。确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牵引,在更加系统、更加综合的层面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的全面创新突破:其一,将人的现代化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拓向“五位一体”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其二,认识到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动力内核、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发展形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原则,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典范;其三,从整体上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社会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坚实的政治制度支撑。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了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和实践经验,研判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形势,将对现代化认识的百年智慧凝结成全面而深刻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对现代化本质内涵的回归和跃迁。

五、结 语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始于宏大的社会主义愿景,历经建设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基础厘定,最终走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逐步实现了对现代化目标从宏大到具体、现代化策略从重点推进到全面发展、现代化模式从模仿到超越的认识跃升,形成了以充分运用实践认识论为基础、融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精神内核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

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历史视野中,“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统摄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般现代化的综合性特征^[53],是中国从封建文明走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综合性过程。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为根本宗旨。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认识的百年探索、反思和凝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于政治现代化,选择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进而聚焦经济现代化,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物质支撑;始终探索推进人的现代化,探索了从人的思想到人的生存需要再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在新时代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向人的复归。

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才能更好地出发。步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宝贵经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初心;坚持实践观点,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不断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高效推动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陈家喜,邱佛梅.主动式、递阶式、渐进式:政党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逻辑[J].科学社会主义,2022(2):123-129.
- [3]李斌雄,魏心凝.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8):10-19.
- [4]张斌,王姝.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J].江淮论坛,2022(3):113-118.
- [5]钟慧容,刘同舫.中国共产党现代化事业的百年历程与经验[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23-31.
- [6]成龙,郭金玲.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5-14.
- [7]王赟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生成逻辑[J].东岳论丛,2023(4):13-19.
- [8]孔祥智,谢东东.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探索历程、基本内涵与实施路径[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2):82-91.
- [9]王建国,陈莎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探索之路[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3):19-26.
- [10]骆郁廷,轩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与实践进路[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8.
- [11]齐卫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3-10.
- [12]熊秋良.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个维度[J].求索,2022(1):22-29.
- [13]陈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2):16-21.
- [14]罗平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J].历史研究,2021(2):29-37.
- [15]张雷声.从现代化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5):13-22.
- [16]任晓伟.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科学建构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时代逻辑[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2):55-61.
- [17]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8]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3-104.
-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
-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84.
-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3.
- [30]白永秀,任保平,何爱平,等.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9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96.
- [31]汤建.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理论探索——毛泽东人的现代化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学习与探索,2012(11):157-160.
-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3.
-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 [3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97.

-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
-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39]高小平,陈宝胜.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理性历程——基于政府机构改革阶段性特征的研究[J]. 学海, 2018(3):70-77.
- [40]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90.
-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43]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44]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9.
- [46]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47]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
- [49]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9-22(1).
- [5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12.
- [5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53.
- [53]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

Evolution Process and Rational Logic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EN Baosheng, LI Xuemin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condensed in the century-old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ration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conducive to better grasp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political direction, focusing on specific practice, reconstructing economic goals, and deepening comprehensive systems, gradually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grand vision of socialism to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focusing 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led by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ublimating and condensing into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hich focuses on “people-centered” and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five-in-one”, completing the transition and sublimation of understanding, inheritance,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n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ummar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etter promote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PC;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volution of connotation; rational logic



(责任编辑 张伟 李裕政)